

[主持人语]

西南研究：地方、边省和国家

徐新建

在如今的中国版图上，西南日益成为意义凸显和世人关注的重要单位。自司马迁的“西南夷列传”以来，世人对西南的关注和研究可谓内容多样、纷繁不一。与此并行的是，作为与中原及其他区域相对不同的文化地理单位，西南诸省区的族群与文化也堪称交错兼容，各具特色。

本专栏邀集部分论者从历史、经济和人类学角度对西南研究加以回顾和扩展，在对象和论题方面学科的汇通和行省的交融，以期形成较开阔的交流对话。其中内容兼顾西南诸省，有的关注一地，或滇或黔，有的淡化边界，突出跨省关联。论者的身份内外有之，所言问题亦力图彼此相关，

互为印证。萧霖红考察宗教，论说明清时期傣族土司崇奉道教的文化轨迹；安琪的文章以云、贵、川三省的田野考察为基础，描绘和分析了西南“民族博物馆”中的族裔叙事问题；笔者与彭文斌的对话，由“帝国”、“边疆”和“国家”等关键词入手，梳理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南研究的复兴和演变，提出了一组有关的反思问题。诸学者的视野、方法各自有别，但对于西南研究的关注和实践却体现出内在的呼应和关联。

总之，“西南研究”历史久远，议题繁多，近代以来更可谓此起彼伏，方兴未艾。本专题只是其中的一种延续而已，期待更多的批评和回应。

西南研究答问录

徐新建¹ 彭文斌²

(1 四川大学，四川 成都 610064; 2 哥伦比亚大学)

文章编号：1002-6924(2010)02-118-125

[简介] 西南研究是自《史记》以来学术与政治关注的核心话题，也是人类学引进中国后学术界不断论争的场域，嵌入了帝国、边疆、国家、区域等各具张力的命题与意识形态视野。本文由两位长期从事

西南区域学术思想史的学者的问答构成，通过反思与对话重温和讨论了与人类学的西南研究相关的人际、观念与范式等诸多问题。

作者简介：徐新建，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四川大学校级年度项目《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与共同精神家园建设》阶段成果。彭文斌，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徐:我们这次的对话主要谈问题吧,具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个人、学科和区域,如何?

彭:可以啊,这样谈话的主题更集中,线条也更清楚。

徐:我们的对话,是当下知识生产的演变中,通过主题性的设计出来的一种声音。它与其他一些方式,比如说研讨会、论坛、文集等构成更大的整体。对此我觉得是需要有自觉意识的。现在有很多人卷入这样一种群体性的表达。但其中有相当多的人在被访谈的时候,其实被变成了一个隐蔽性文本的段落,或者说变成了一种装饰和道具,时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切割,被置换,被组合。像当下电视节目里出现的许多“专家”,表面上是在主动和自我的发言,实际上只是在为一个设计好的台本提供台词。因此我认为对于访谈,就如到田野去考察一样,首先得确保双方知晓访谈的框架、目标和基本意图。从而尽力使其后呈现的“实录”更像对话和交流,而不是单向的截取或宣讲。这样的沟通越深,参与人的自觉就越厚重。

第二个呢,是人际间的学术因缘。在我看来,任何学术成果都与特定的人际因缘有关。知识生产可以还原为社会生产。其中的内在关联是值得关注的,简单说:学术成果需要学术阐释,学术阐释离不开学术批评,而学术批评中最重要的方式之一,便是知人论世。由此就需要了解和分析与特定学术成果关联的人际因缘。

所谓人际关系,包括学者和学者、学者与村民以及村民与寨老之间,是很微妙的。它们构成了社会实践层面的学术交往,在特定时候形成一种整体表达。比如你和我,从表面的追述来讲,我们有十多年的交往,并且有不少共同的话题和兴趣。但仔细分析,其实我们又有许多不同。这种不同形成了对话的可能性和学术张力。从学科区分说,人类学和文学就有不同。文学有比较完整的社会知识系统,从创作、理论到接受与批评,其中包括了作者、读者以及想象和现实。作为社会生活及历史文化的一种对应,它的呈现框架是很完整的。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学的批评不足,尤其对于自身文本生产及其社会传播的效应与局限反省不够。

彭:关于文本生产与个人因素,以及文学和人类学差异的问题,我觉得很有道理。从我本人来说,我也有文学的这种背景。我知道在谈到批评意识、自我的主体性的这个方面,文学对自我所做

的东西是有高度批判性的。人类学也是一个范式接着一个范式的替代。它对自己研究的对象,有不同的模式。它对自己所做的,有比较强的信念,就是要改变世界。它对自我所做的东西,是批评不够的。这个从90年代以后,有学者研究“写文化”问题后有了变化。人们认识到,人类学也是一种知识生产,人类学的民族志写作也是一种文本的创作,开始有了这样的反思,不过的确还远远不够。

徐:这是个大的话题,值得专门再谈。我现在说的学术缘分是个别性问题,其隐含着什么样的学术信息,在共时前提下的差异是相对的。像你说的西方的学术批判、西方学术史的更替,相对来说,在空间上讲,就和非西方世界形成一种良性的张力。在大陆的学术经验里,这种反思和自我批判是比较缺失的,人际间的差异更多的时候会体现出一种非学术化的人事之争。因此,我比较看重以这种对话方式进行的学术史讨论和反思。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对话是有效的。

第三是研讨的互文性问题。我觉得我们的谈话大于一个表面的栏目专题。我们关注的表面是人类学的文本和表述,其实关涉到学理探讨和社会实践,关系到区域研究、西南问题、藏彝走廊等等。其中任何一个话题的意义都是相对和流动的。我的看法是,现在的研究过于单面,缺少相互联系同时更缺少与前人成果的承接。不少论述批量生产出来,但水准远远低于前人。我们现在开口说话,西南如何如何,康区如何如何,走廊怎样怎样……殊不知翻开民国甚至晚清作品,才发现许多话题前人早就说了,而且说得远比今人客观深刻。所以在这意义上我们需要与历史对话,向前辈学习。至于我们横向间的交流,自然也就会在有深度的对话中彼此互补。

第一:学术前提下的个人经历

彭:新建兄已把开场白说的很好,很从容了。而且我们今天交谈的这个地方也选得很有意思。三圣乡是施坚雅当年曾经待过的地方。在1950年的样子,他有3个月几乎天天坐在这里的茶铺里,观察川西集镇的流动与周边社区的关系,并以高店子为起点,构思出了他的集镇理论,然后走向他著名的宏观区域理论,在这起点性地方作些有关西南区域研究的学术回顾,有一定的观照意义。

新建兄在去年的大理会议上也提到过,作为一个学术史的分支,西南研究从抗战时代的国家文化到五十年代的民族构建有自身的轨迹可循。刚才你提到很多与学术因缘有关。我觉得,作为今天谈话的场景选择来说,这里是很合适的。第二,我个人学术因缘,也深受新建兄影响。从1996年我们在贵州见面,就不断跟踪学界,包括新建兄在西南研究方面的情况。从区域学术这个层面来讲,新建兄也算是代表了一个时代——九十年代的那批人。你们那时的西南表述,即对整个西南的研究的反思,有点像赛伊德东方学式的表述,可能在全国也是很少见的,形成了一种新锐的知识力量。

徐:看到我们曾经做过的事情现在有那么多人继续在继续做,让我感到很高兴。对于个人在人类学史上的角色,若放在学术问题的前提下来谈的话,回答的方式有很多。我们就从西南研究说起。

西南研究放大一点,表现为区域研究。本来我可以做华北或其他地区的研究。这里面有个人的偶然性,因为我的经历是以西南为主。但是我很明白——不是现在,我当时就明白,西南是个符号,可以被置换。作为区域,它的意义和西北、华南、内蒙古等是一样的。当我们在讨论西南研究“总序”和我写《西南研究论》的时候,一直在表达一个观点,所谓“西南”是一个王朝或国家的西南。也就是说在更大的框架下它只是其中一个单元,是可以和别的单元对等、置换的。这是当时的一种解释和发挥。此外在学术史的联系上,我们和前辈的关系很重要。我发现从民国到当代有一个很大空白。其中许多主要成果被忽略、遮蔽,乃至被有意识的埋葬了。在90年代,普遍性的社会意识和民众认知,是建立在一种被国家主义、行政区划化和单位所有制锁定的身份基础上的。思考区域的问题受到很大的限制。我们想做一些超越,即超越这种锁定,又弥补与前人之间的空白。当时我在贵州社科院,在讨论贵州的地方文学时发现八十年代出名的一批贵州作家有一个致命伤,就是缺少国家眼光和终极关怀。他们的写作有的不错,其中还有作品获了全国奖,但在对社会描写和人生表达上,充其量还只是“二级批判”。我觉得地方的作家随便怎么写,不能在中国的意义上来思考本土的问题,更谈不上有人类意义上的反思和关怀。这些作家有太强的地方性,习惯于以省为界,一旦越界便无话可说,表现出一种自我行

省化。

文学是人类的普遍性的表达,它有特色,有乡土,有国家,但真正文学界承认的上乘之作,是写人类的永恒话题,写生死爱恨。我觉得当代中国的地方文学局限很大,有太多的行政和等级化色彩。这种情况在八十年代第二次“西学东渐”后才逐渐改变。改革开放打破1949年的界限,开始还原一个完整的二十世纪中国史。还原的前提是思想解放和比较古今中西。20世纪两半块,前后悬殊很大。思想解放不是空头的,是拿人物来解放、拿问题和作品来解放。过去的作品摆在那里,你们看嘛。现在很多人不看,有些人故意不看,故意不引,生怕引了会显丑自己。你看,拉铁摩尔敢说长城内外、敢说内陆的亚洲边疆,费正清可以提出挑战一应战模式……后来的中国学者们呢?所以我们在80年代,为什么要做西南研究书系,动力之一是参与第二次西学东渐、融入第二次思想解放。

那时我们的书系编委会,一开始也按行政区划来组建,编委打算就按川、滇、黔诸省物色。主编张诗亚是重庆的,其他编委史波、郭净、邓启耀、刘小兵等分别来自云南和四川。我则来自贵州。但是我们通过丛书创立了一个新的西南身份和流动的认同。如今我调到四川,在成都工作,在身份的第一层面上我还是认同西南而不是行省。所以在川大上班,就好比在一个有特定地点的工作站,像动物学者在卧龙、气象学者在南极。所以我觉得这些年自己是客居、挂单。这不是开玩笑。按生命的本性,人挪活,树挪死;人是需要交往和流动的。可是在(19)49年以来的体制里,我们受行政的桎梏太深,而且人就是螺丝钉,钉在一处,直到锈烂。我们就想通过西南书系这样的学术实践,来解决部门所有制,身份行政化的限制。

彭:从学术身份意义上来说,我们这些学人中跨得最多的还是你了。跨学科,跨区域,现在又是跨省。看来你们跨的冲动在当时是非常强烈的。类似的跨越,那时“西南民族学会”的学者也在做,但他们虽然超越行政区划的架构,但不在于要解构这种边界,而是借助于省级相关机构来协调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当时出现了一种趋向:中央的社科研究省级化,地方社科院走向本土化。国家学术的既有体系打乱了,各省都出现了一种超越。

徐:你补充得很对。这个现象,对既有体系的超越,从长期来看是个亮点,并且有共同性,比如

西南研究学派——我很看重这个学派，包括童恩正的南方民族考古。当时很多人，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的参与到了其中。这是第二个关系。第三个关系，就是地方和国家的关系。西南研究这个题目，值得我们反复回应。怎么会有西南研究呢？在原有的行省体制下它是难以被批准的呀？然而尽管一度有过夹在中央和行省之间的西南局，但自其被撤消后便没有一个相应的行政区划，没有主管西南研究的部门，从而使跨省区的西南研究得以形成。

当时我觉得，在既有的国家体系中，西南是个特殊的单位。由西南出发，通过国家和行省的关联，我们可以重新认识什么叫地方。我们可以去观察历史的中国，从天下到王朝，从地方到中央；去看大一统国家下的“地”和“方”。也就是认识地方的区域化和国家化。什么叫“方”？在天下范畴里，“方”是一个部分，是具有对等意义的空间；但国家体系里，“方”变成了隶属单位。它不能自在自为，而是要被规定、被管束、被制约和被建构。有了这个发现，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通过西南这一“方”再与其他各方对应，就可以更好的认识中国的区域分划及其相应的行政特征。这样的研究我们才刚刚开始，西南也只是一个单位，远远还没做完。

第二：问题关联中的学科

彭：因此超越行政区划是起始的一步，而对学科的超越也很关键，想来你是对此深有体会的吧？

徐：关于学科及其日益强化的相互壁垒，我感到比较悲哀。进大学工作后，受其影响，我自己也在自觉不自觉的“学院派化”。从社会分工来说，学院和学科都是需要的，但学科分离和学院派化却有很大危害。学科是知识的局部体现，大学可以是学科的集合。在这方面，古今和中外是有所不同的。中国社会有三统——学统、政统和道统。大学（书院、科举）是守道统的。我们现在的大学守什么呢？很难讲，以前是意识形态化，现在则越来越讲求功利和实用。在这种情况下的“学院派化”有很多表现，其中一个就是画地为牢的学科分离。我们当时做西南研究，有没有学科在其中呢？有，但是以问题为主来运用的，而非相反。我们强调问题的第一性和学科的工具性。比如我们关注

国家与地方的关系，这是第一性的，其中可能会涉及到地理、史学与政治学等多门学科，但如果你把后者作为第一要义而把前者仅视为对象或材料，那就弄颠倒了。当然我也理解重视学科建设的人，他们的习惯是与此相反：突出学科，轻视事像。这没关系，多样并存，各行其是就好。但不要用学科去裁剪生活、弱化问题，更不要形成脱离人生的“唯学科主义”。

我们研究西南问题的时候，从参与的同仁来看，大家的学养来自并包含了多门学科，而且具体运作起来，还时时不够用。如果当时知道人类学，肯定就放上去了。没办法，还不晓得嘛。当时很清楚，一切可用的学科，都应该平等和有选择的对待，而且运用起来最好是多学科、跨学科。

彭：很有意思，刚才新建兄讲的跨学科、跨地域，一个是跟国家主义，一个是跟科学主义唱对台戏，体现了当时一种百科全书似的视野，想把各个方面都纳入里面，是很不一样。其实人类学也具有一种整体的观念，只不过随着后来的学术专题化的发展趋势，研究的框架趋于狭窄。

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格局中，民族主义和族群问题彰显，西方人类学在90年代初（重新）进入西南的时候，他们只有一个学术理念，就是族群认同的研究，以族群来谈，他们注重族群的分类界限，不会去过多思考跨区域的问题，当然这里也有传统人类学微观村落与群体研究的因素。而像童先生的南方考古这样跨区形式的研究，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所以说对于区域，中国和西方在观念上有很大差别。你们的跨学科和跨地域已经超越了同时代的西方人类学，已经开始思考地方和中央的关系。郝瑞说，中国人类学可能在当时（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很多反思性的东西。我觉得当时这种局面肯定是多元并存的。你们那一代才有公共知识分子那种很强的使命感，和我们做的不一样。我们就是有一种学术意义，但是你们里面带有更多的是那种关怀，像乐钢说的，有强烈的参与意识。

徐：这个话题值得讨论。我认为差异的表面是学科界定和边界分野，背后实际上是学术实践，关涉到每个学术参与者对自己学术身份的选择。你说我们当时的选择体现出一种和西方的联系和区别。为什么呢？对我们来说，当时的选择有几个资源，我们力图去接受和继承。以个人的身份

为例,“学者”不是我们的初衷和目的。学者就是现在的专家或技术官僚。在解决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议程中,学者可以提供分类知识和局部意见,但远远不够。为什么呢?学者不能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比如说面对地方行政化和部门所有制等,现实情景是大一统的国家主义不断强化,而由于不作根本性反思和批判,学者们无异于进一步复制和再生产这样的结构。所以对于现代的社会分工来说,仅有以学科区分的学者是不够的,需要有创意的思想,还需要其它尤其综合型的人才。并且即便是学科建设,也需要有基础性的思想构建和学理反思,而不能仅仅是技术性的知识垒砌。

彭:你刚才谈到了当初这个时代是特定的时代,人们也有特定时空里的社会关怀。其实我有个问题想问,对于西南研究,从学术传承来讲,你知道凌纯声、芮逸夫等人从三十年代就有类似的社会、民族与国家关怀。民国时期来华的西方学者中也有宏观的区域类型,比如以研究通商口岸著称的费正清、研究北方长城内外游牧和农耕文明的拉铁摩尔,以及研究南方集镇与区域的施坚雅等等,应该说他们也有一种域外认知中国的学术与社会关怀。

徐:这样的比较是更有意义的,不过还没有到总结的时候。西南研究之后,我在川大和石硕等朋友一起做“藏彝走廊的人类学论坛”,我的一个愿望是想再次提醒:即便关注一个民族走廊,也不能闭门造车,而是要联系前后左右,也就是要跨地区、跨学科,要读前人的成果,不能满足于在旧框架下贴新标签完事。

你的回顾是对的,施坚雅从市场超越、拉铁摩尔从长城两边看、费正清则发明出挑应战模式……都是值得后来者承继和反思的成果。我想提醒的是一定要注意包括这些在内的前后关系。其中尤其重要的就是前人的区域研究。我们这个学期的博士生课,就结合“藏彝走廊”课题专设了有关区域研究的学术史综述。

彭:那就是说“学院派”里也带有一种知识的体系,有相当的积累和可资借鉴的地方。

徐:我并不排斥学院,而是说要有所警觉,警觉学院派及其画地为牢的局限。我们喊“破学科”,不是否定学科,而是破除学科边界。以人类学为例,我们的一个重要话题是突出人类学与整体研究。人类学是研究人的,相比之下,区域研

究、族群研究,乃至国家研究,都只是人之研究的局部,如同盲人摸象的一只手。而强调整体的人类学试图把这些手联合起来,去走近这只大象。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学提供了一种方式、一种视角。它把古往今来的民族个体看成有共性的成员,把人类看成一个可以并且必须被认知的统一体。在这个方向下,不管古今东西,五洲四海,都能够在人类学的统合下来认知及整合。而深入到现代学科阵营里看,几乎每一个学科都在占山头、划地盘。我在中央民大“学科重建以来的中国人类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回向整体人类学”(后来发表在《思想战线》2008年第2期上),部分表达了我对中国人类学的一个希望,即一定要在空间上把中国看成人类的一个部分和世界的一个区域,让中国的人类学融为人之研究的整体部分而不是让人类学在中国变为民族学和社会学,变成汉族和少数民族研究。中国的历史漫长、人口和文化类型那么多,难道不应当出几个达尔文和摩尔根那样的人类学家,努力总结和揭示人类存在的基本类型或总体特征?但现在的趋势恰恰相反。与其他大多数相关学科一样,人类学在中国表现出过于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倾向,合起来就是强调一种国族至上。

照道理说,中国的人类学和西方形成对话是可能的。中国人类学在这方面不是没有资源,可惜古时的唯我独尊和近代的国族主义使之受到了限制。其实在《西南研究论》的总序和结尾部分,我就提到了这种对话的意义和可能。

彭:在90年代,更多感受到的是你的理想主义色彩,现在感到似乎也越来越规范、越来越学院化了。

徐:这种变化是表面的,是一种妥协。与当时的社会语境来看,对话的有效性消失了,你必须改变。其实我内心是不很认同的。我们现在要借鉴人类学的表述体系,目的还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按我个人的习惯,更愿意讲一种没有学科痕迹的日常话语。但很难,不过值得争取。这个话题很有意思。比如我最近关注几位华人人类学家的写作变化,从李济到费孝通以及张光直和李亦园,他们在晚年都有一种回归,回归什么呢?回归到传统儒学。李济讲荀子、张光直谈《礼记》、费孝通和李亦园讲“和而不同”与“中庸之道”。本来人类学是很西化的,结果他们都回到了儒家。费孝通连

表述方式都在转变，比如晚年强调的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那样一种“十六字真言”。

彭：看样子新建兄对人类学这门学科寄予了更多的厚望，很看重它的普世性价值和人文精神。而我们在人类学的圈子里面，近年来体会最多的是它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如“表征危机”，殖民主义遗产的反思，研究框架的非历史性和大语境的局限等等，实在感觉不到那么美好。按照新建兄的思路，你所期待的这种人类学做到后来就是人学、哲学，就是一种思想。

徐：不，不是要把人类学做成哲学，而是它本来就有这样的内涵。现在我们的研究断掉这个内涵是很可惜的。比如做藏学，你研究的单位是一个区域、一种文化，还是一个行政地方就关涉于此。在其中，“转山朝圣”这样的现象和议题，由于视野和观照的不同，看到及得出的结论就很不一样。受行政区划制约的考察者会把它视为特定乡村的民俗事像乃至可供开发旅游的地方资源；而结合的学者则从中比照出族群文化所体现出的不同“人观”、“自然观”与生死对待。

彭：有个问题，关于你提到的学科的反思和突破。我想到在欧洲，过去的学者，是有过百科全书似的视野，不过当学科科学化、机制化以后，就建立了各自的界限。如今又出现了一种反叛，从部门到区域到学科，从头到尾都体现着一种抗争。我在贵州的时候，你谈到了贵州和西南的特点，与众不同——

徐：与中原不同。不仅贵州，是西南和四夷。

彭：由于这种不同，于是要对既有成就提出挑战？

徐：准确说是在挑战和进出之间。完全的挑战就意味着离走了嘛，不是这样，而是在里面出出进进。

彭：可否说这样的境界就是为我所用、超越，比如文学人类学，关怀的是问题，不是学科？

徐：差不多。

第三：区域研究

徐：前面谈了西南研究的大体脉络。这样的回顾和展望我们当时就有意做过。如今可再比较一下两次的异同。“西南研究丛书”的导论是我写的，但经过编委会成员的长期讨论，有一定共同

性。对于回顾和展望，都有具体的表达，一是“超越西南观”，一是“呼唤新学派”。

那时我们是在强调一种区分，想通过这个书系，区别于既有的一些研究模式。这个区分就是说，90年代前的既有模式，需要推进。推进的第一个参照，便是民国时期的前辈成果，因为那时就出现过类似于学派的团体及其相互论争。推进的另一个参照是突破后来的单一的意识形态禁锢。在19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讲学派是犯禁的。我们呼唤西南学派，是希望回复百家争鸣，提倡多元话语和学术自由。我当时的理解是，西南研究主要经过了两个阶段，即从司马迁以来的从“他称”到“自称”之演变。后者即本土、本族人的自我表述，比如刘尧汉等代表的“彝族学派”。但我们不满足于此，还期待超越，因此呼唤“第三人称”。前两种人称互为对待、置换中心，性质一致，不同的只是分别把中心变成另一种他者。它是替换似的，像封建时期“打倒皇帝做皇帝”那样的历史循环。西南研究如果只是把他称变成自称，或把自称变成另一种他称，就不够。

彭：这些思考很不容易。“第三种话语”的提法体现着更深的多元。

徐：当时我们的呼唤和预期只是一种愿望。我们无法预见某一天，甚至不能想象今天已经实现的一些目标。在80至90年代，这些变化是琢磨不定的。如果按文革结束后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中国社会或许会更为多元。但这进程不久就被终止了，接下来的又是漫长的反复甚至停滞。不过这样也好，变化也帮助人们重新认识中国问题的复杂和大一统观念的强大，从而认识到打破禁锢的不易。十多年来的收获之一，是使我更进一步理解了刘尧汉等对本族成就的维护及后来阿库乌雾等对母语传统的坚守，同时感受到华夏本位和中原中心主义对多元共同体的制约。

彭：我觉得西南研究的对象，不光是一种他者声音的发现。现在你既要面对内部的本土化的声音，又要面对西方化之间的交流，80、90年代以后，提出西方学者对西方体制的判断，从一种反对中原中心主义到反对一种西方中心主义，西方学者的研究模式、他们研究经历以及他们的研究观点，你怎么样看待呢？

徐：我是通过个人经历的来感受这些问题的，包括80年代初期见到张兆和、张慧贞等来自香港

的朋友,都对我的认知产生了影响。当时的认知是零碎的,所谓反中心主要是反垄断,就是反对国家话语对地方学说的垄断。中心的人总觉得代表国家,其实是企图通过掌控权利而获得资源垄断、机会垄断和话语垄断。这就激起了地方学者的情绪化抵抗。现在来看,那还不是有序的、有理性的反抗。80—90年代是反抗多于反思,并带有明显的各取所需。进入2000年后才逐渐走向对“中心话语”的整体反思和批评。这时有了谱系突破和观念自觉,对西方体现为“东方学”和“后殖民主义”,对国内则是“内部东方主义”与“多元一体”。从我个人经历讲,到川大后开始自我补课,纠正了一些当年的偏激,同时也对问题的要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有了这种转变后,更有助于与各方的学者接触沟通,以及通过教学有效引用海外学者的多元理论,比如拉铁摩尔、施坚雅、张光直也包括郝瑞等等。

对两岸之间也是这样,近年来我们开始与台湾地区的学术机构有了一些实际的项目合作。学者间的交往也逐日增多。这使得我们比原来更真切的了解到彼此的相对共识和区别,扩展了大家的视野。值得提及的是,在大陆与西方交流与对话之间,台湾其实是有意义的平台和借鉴。通过他们,可以了解到中西之间不同的理解方式和兼容可能。

在差异方面,中西之间也是存在的。但如今好像正被90年代以来的交往所掩盖,很多人会误解我们和西方学者一样的。其实不然,从路径、方法、观点、取向等方面都有许多不一样。另外一点是“同质化”,就是在表面上把西学本土化,造成一种圆融融的,天下一家的假象。实际上是丧失本土,丧失本土成为世界共同体的一个区域性的对话者之身份和对话的资格,假如他本可以也应拥有的话。从西南研究来讲,07年我们在大理讨论跨界,即关注一个跨学界、跨国界的西南研究。但可以看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并没有澄清我们自己的范式。如今的范式我们可以看成假借的文本、具有普适性。是不是这样的呢?不是。我们应当在中西交流、交融的基础上,冷静地看待彼此的根本性差别,然后根据差别进行对话和讨论。这个差别的最大一点,就是各自传达对象的不同。西方学者到中国来作西南研究,成果面对的是西方读者而不是中国社会,说到底其最终加入的是

西方自己的知识生产。对于中国学者呢?刚好相反。不过现在问题已在转变,大量西方的知识产品被引进中国,并且由于其相对的客观、严谨和新颖而大有取代本土成果的可能。你看现在大学里的年轻学生,以西南研究为例,只要能找到同类的西方著作,本土产品基本放弃不读。他们认为相比之下,本土作品大多没有思想的原创性,还停留在低水准的重复制造和对“假问题”的渲染浪费上。因此面对全球化学术竞争,如何对待20世纪以来的第三次西学东渐,将是一个复杂而困难的任务。

从今天的发展来看,中国学者在西南研究领域仍是残缺不全的,甚至一些地方仿佛是在倒回到旧的叙事,即地方叙事、单位叙事和学科叙事的套路之中。这是很可惜的。90年代,当时我们是关起门来自我比较,现在上网一查,许多论述真是经不起细看,问题很多。另外从学理上讲,目前出现的一些话题和论争则需要引申,需要对话,以便形成新的表述单位和方法,比如范式、区域、帝国。我希望能一定程度上改进现有的西南研究视野。当康定被叙述为“藏彝走廊”起点与中心的时候,我把它表述为更大空间——横断山走廊的部分以及汉、藏、羌、彝等文明圈的交汇点。目的就在于从帝国和区域的视野拓展走廊的意涵,从而呼唤新的认知范式。

彭:在西南研究中有那么多词,像藏彝走廊、康藏研究、华西人类学,纷纷出现的时候,大家都在想尽量从多元和整体性来把握。这样说来西南研究也许只是一种符号,只是所有符号其中一个符号。

徐:是一种符号。西南是依托在公众和国家都比较正式使用的一个单位符号。在20世纪中期其还有正式的行政所指——西南局。它曾比民间所谓的“六江流域”、以及后来的“藏彝走廊”等更具有现实合法性。可以说正因为自《史记》以来,“西南”这个符号长期隐含着强大的行政权力,如今的学界和民间想要超越,却难以找到有效的替换词语。为此我觉得西南研究在今天,在学术的意义上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去行政化”,去这片区域的“自我西南化”。

彭:现在有两个观念,有些时候在合,有时候是分。人类学界在跨区域的时候,也在重构文化区,想超越边界和文化特质。这要看你是以文明

观还是文化观来研究。当你以一种文明的视野,站在西南,反对中心主义时,总是有一些格格不入。如何把汉学人类学和边疆人类学结合在一起。这里面有张力,也有话语的权力。我们在选择文明,什么样的文明?也许文明观就其目前的运用来看,更多隐喻的是主流的汉文化对边疆的渗透,而边疆人类学对族群的描述还是基于文化的概念。新建兄,你觉得对于西南,用文化来研究?还是文明新视野来研究呢?

徐:这需要分别看待。现在有很多人在研究西南。有的以文明、有的以文化为边界。我觉得这代表研究者自我的学术取舍和目标。其中不少人是在做知识的自我生产、自我建构,通过他者,表述自我。

如今在公众的心目中,对于关注和研究西南的人有种假象。第一,他们代表真理,代表进步,代表全知全能。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学者通常只说“我们”(we)而不表明自己只是 one of some,其成果也装扮成“所有”(everything)而非“局部”(some of them)。其次还总是把“我们”(we)——具有话语权的讲述者突出为文明的象征,方式之一是把被讲述的对象描写成落后、野蛮。

现在我们几位文学人类学同仁做的工作之一,便是在表述的基础上破除“文明”话语对“他者”的侵害、扭曲。长期以来,西南研究中的文明论者习惯于在汉族与少数民族里把蛮夷说成是文明的对立面。正如世界范围内不能仅以西方为尺度一样,中国境内的文明怎能只有一个单一的中原标准呢?事实上那些被视为“野蛮”的文化和族群并非文明的对立面而至少是文明的其他类型。

西南研究的拓展路径有两个,一是学术史,一是学理逻辑。从后者来讲,我觉得“帝国”这概念可以与“文明”并用。相比之下,如今的“文明”这个词有过于浓厚的西方进化论色彩。

彭:当“文明”话语投向西南民族,你可以通过西南民族整合,用中华来与西方进行对话,进行对抗。另外若以“文明”为边界,就不是在同一轨道之下,而是被同化、涵化和现代化。所以我想本来就是多元概念,最关键的,缺了一些很扎实的东西。那就要通过很具体的东西,通过文化特点来超越。

徐:区域问题如果作为我们对话收尾的话,是最重要的维度。西南是超越行省、超越地方的。

在“西南”这个符号下面,真是存在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和千万年的历史演变。我们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它、理解它。唯有这样,学术层面的“区域”才会同时具有方法论与价值论的意义。

彭: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人类学现在有两个很亲近的分支在国内很流行,一个是文学人类学,一个是历史人类学。这里面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是,一般的人类学家在历史人类学面前显得功力不够,应该进一步历史化;另一个方面人类学家在看文学人类学的时候,觉得比后者更了解真实,你怎么看呢?同时都热火朝天的,为什么会有这种错位感?

徐:这样的提问暗藏杀机啊,你不会是想隔岸观火,“挑起群众斗群众吧”? (笑)但这本身是个有趣问题。自1980年代复苏以后,人类学在大陆形成了不少新的分支。除了你说的两支以外,还有都市人类学、医疗人类学和影视人类学等。不过其中各自的缘由、领域、目标和走向都不一样,很难对照和攀比。不过总体上讲,我认为它们的出现代表着人类学在中国“后新时期”的某种繁荣和转型。只要不固步自封,对于进一步突破既有的观念框框和学科套路而言,其必将有所助益。我个人认为文学人类学还处在试验阶段,需要较长的时间检验和成型,更重要的是需要有扎实和公认的成果才能支撑。

作为结尾我想强调的是,人类学不是国史,不是方志,不是家谱。人类学要想真正进入区域研究,期待的是人类眼光而不是国族主义或学科主义。我期待历史人类学把中国史视为世界史的部分,把“辛亥革命”发掘为更有世界性的事件。相对而言,文学自古到今都力图通过个别去观照人类整体,透视普遍人性。它希望通过地方的仪式、神话、民歌等表面看属于区域和族群的事像,去描写和揭示人的问题。

谢谢你的提问。未尽之处,以后再说。

[本文系有关西南研究的学术回顾和讨论,形式是彭问、徐答,实际上涉及到对诸多问题的对话与交流。其中一些内容以前讲过,这回略有展开(参见徐杰顺、徐新建:《走向人类学》,《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此次答问是08年夏季在成都陆续谈的,由博士生刘亚玲录音整理,特此说明并致谢。]

[责任编辑:明秀丽]